

清塘村轶事

◎徐光海

一个农家小院有一棵树龄超500岁的巨大的铁树,这是20多年来我对模环乡清塘村一直念念不忘的一个原因。入梅后的第2天,天空沥沥下着小雨,我驾车沿320国道往北约5公里再折东1公里,再次来到清塘村探访那棵铁树,由此感受清塘村深厚的历史文化风韵。

进入村口,“清塘水库”4个大字映入眼帘。该水库原为一口水塘,因水质清澈,被称作清塘,清塘村名即由此而来。清塘村主姓徐,南宋祥兴年间(1278-1279年),溪口灵山徐氏一族人丁兴旺,四散迁居,其中上乙太公看中清塘山多田多,遂迁入清塘定居。上乙太公迁入清塘后,先后生育了10个儿子。一家大小10余口,家庭负担重,上乙太公外出谋生,结果多年杳无音讯。上乙太公妻子含辛茹苦,将儿子们一一抚育成人,为儿子们娶妻生子,于是徐姓在清塘村渐成一大望族。清塘村现有近千人口,徐姓占其三分之一多。在清塘村,迄今流传“清塘只有上乙阿太,没有上乙太公”之说。

清塘村有众多的民间传说故事。明朝年间,徐氏族人中曾出过一个“瘸腿县官”徐成栋。据传徐成栋祖上去世下葬时,风水先生选中了村北面南基山上的一处墓地,说此风水可保徐氏后代出

7位官员,并一再嘱咐需等他到场后方可安葬。帮工挖好墓穴时,见底部有一大石块,以为石块下有宝藏,没等风水先生到场,便用铁锹掀开大石块,却见石块下有7只白老鼠。众人见鼠便打,6只白老鼠当场被打死,1只白老鼠被打伤了一条腿后逃之夭夭。因破了风水,后代仅出了这位“瘸腿县官”。直至清朝末年,才有一位徐氏后裔徐贞森任龙游县长兼教育长。

清塘村南面耸立着一座雄伟秀丽的牌坊,系龙邱邑庠生徐启东之妻余氏贞节坊。徐启东因病去世,余氏二十出头守寡,终身未嫁,尽心抚育子女、侍奉公婆。清嘉庆13年(1808年),龙游知县黄恩培将余氏事迹上报朝廷,次年朝廷下旨,为余氏建造贞节坊,以示表彰。建成后的余氏贞节坊坐北朝南,四柱三间五楼,石质,通高7.65米,通面宽6.27米。额枋浮雕双凤、祥云、花卉、人物等。明间额枋刻“心昭日月”,背阳阳刻“志冽冰霜”,并署“嘉庆庚午年(1810),为邑庠生徐启东妻余氏立”字样。正脊设正吻,抱鼓石饰回字形蟠螭纹。后又建一幢面积约300平方米三进两明堂的楼房,供余氏母子居住。该楼房前厅后楼,大门匾额书“钦葆节孝”四字,各级官员路过楼房时文官下轿武官下马。传说某年有位武状元路过

清塘,因天空下着雨,便双手举起一只石臼当作箬帽遮头,欲进楼房内避雨。村里人见其力大,不由得发出“哎哟”一声惊叹,那状元听到喊声头一歪,一眼瞥见“钦葆节孝”四字,心里一惊手一松,石臼跌落门口小水塘。现这只石臼仍斜插于地中,被砌在一农户的院墙上。上世纪90年代,余氏居住的楼房不慎失火被毁,余氏节孝坊则于1986年7月被列为龙游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那棵500多年的铁树如今依然郁郁葱葱,状如盘龙。铁树后有一幢巍峨的民居,石门匾额上刻有“光天化日”四字。这幢民居的来历也有故事。据说清朝末年有一姓朱的湖南籍人在金华府为官,人称“朱大人”。他在清塘村东南面建了一座府邸,闲时常在清塘小住,卸任后回湖南老家养老,便将在清塘的房屋委托给徐氏族长代为管理。经年累月,丁大人并未到清塘探视,于是徐氏族长将此房卖给同村的举人徐南松。朱大人有个叫金奎的家丁得知此事后,连夜打了10多双草鞋随身带着,步行赶赴湖南向丁大人报告此事,从而引发了一场官司。官司打了多年,徐南松花费了100多石计250余亩良田仍未打赢官司。正当徐南松身心俱疲陷于绝望之时,塔石莲塘一余姓人到金华府任职,于是徐南松赠送给余

姓官员4石良田和一幢房屋,这才打赢了官司。后来徐南松将原屋拆除,另择地进行重建。解放战争时期,国民党74师行军驻扎清塘村,该民居被用作74师临时师部。

村西面原有一座五谷殿,位于兰溪到龙游的大道旁,供奉韦陀仙。某年,建德寿昌一带百姓生了一种不知名的病,久治难愈,病人痛苦不堪。韦陀仙化身一路人,布施放药,结果病人得以治愈。寿昌百姓问路人是谁人,韦陀仙回复是龙游清塘五谷殿人。寿昌百姓找到五谷殿,才知那路人乃是韦陀仙化身。早年,农历八月廿三五谷殿庙会,寿昌一带百姓都会前来五谷殿祭拜韦陀仙。

清塘村还流传一个发生在抗战时期的故事。1942年的一天,清塘村徐樟喜和居住在清塘村名叫“德芳”的江西人结伴从龙游县城回清塘,在途经兰塘寺青石桥时与3个日本鬼子相遇。日本鬼子欲抓2人做挑夫,人高马大的徐樟喜和一身武功的德芳与日本鬼子展开了搏斗,三下五除二就将3个日本鬼子扔进了模环溪。日本鬼子爬上岸后,追至五谷殿附近,不见了2人的踪影,恼羞成怒放火烧了五谷殿。

越园“刘略班艺”联归属推考

◎方小康

朋友偶得一幅余绍宋的对联,邀我共赏。

这幅对联尺寸为179×37公分,近5.6平尺,应属于越园作品中罕见的大对子。对联虽为新裱,纸却是洒金红纸,无明显褪色,联为八言联,上下联分别是:刘略班艺虞志荀录 张文朱武顾厚陆忠。

此联出自晚清贵州进士杨调元的《藤桐馆集联汇刻》。杨调元平生嗜书史,勤纂述,擅篆书,古朴典雅。上联“刘略班艺虞志荀录”,源自《南北史》中《梁书·王僧儒传》:“初僧儒与乐安任昉遇于竟陵王西邸,以文学会友,及将之县,昉赠诗曰:‘唯子见知,唯徐知子,观行视言,要终犹始。敬之重之,如兰如芷,形影随,曩行今止。百行之首,立人斯着,子之有之,谁毁谁誉。修名既立,老至何遽,谁其执鞭,吾为子御。’”刘略班艺,虞志荀录,伊昔有怀,交相欣励。下帷无倦,升高有属,嘉尔晨登,惜徐夜烛。’其为士友推重如此。”

上联四姓中,刘歆以父亲刘向编的《别录》为基础,撰成《七略》。班固著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。虞初的《虞初志》《续虞初志》《虞初新志》,合“虞志”,后世称虞初为小说创作的鼻祖。荀勖指的是荀勖撰《中经新簿》。刘班虞荀四人,著书立著,说的是汤盘禹鼎,均为上古的文献。

下联则源自南朝宋时刘义庆的《世说新语·赏誉》。下联四姓,为当时著名的“吴四姓”。《吴录·士林》曰:“吴郡有顾、陆、朱、张为四姓。三国之间,四姓盛焉。”徐震堉在《世说新语校笺》中解释“张文、朱武、陆忠、顾厚”时说:“张,张昭之族。朱,朱桓,在吴并以武功显,未知孰是。陆,陆逊之族。顾,顾雍之族。”

《春晖堂日记》记载了越园抄书《南北史》时的情景。“1917年9月25日。九时到国务院借《南北史合注》一书,居然得许可,欣喜之极。”“9月26日。十一时,赴国务院携《南北史合注》,惜少去数十卷,仅余六十三册,午时到署,因与胡子贤相约合抄,余任《南史》,子贤任《北史》。四时归,检《南北史》一校。”“9月28日。晨起抄录《南北史合注》。”“10月1日。至十一时始散,又抄书。”“10月2日。谈至九时散,复抄书十余页。”“10月3日。八时始起,抄书到十时;晚十时回寓,仍抄书。”“10月4日。十时到署,办公毕即抄书。”“10月5日。晨起即抄书,四时散归,仍抄书至夜十一时止就寝。本日凡写一万八千字。”“10月7日。九时散,仍抄书。”……直至1918年2月12日,下午一时归,续编李本《南史》目录。半年间,越园竟均专注于抄书和校编。

越园书此联并非一时起意,能获得此联者也当是名望大族且为家学深厚之书香门第。那么,此联送与谁?

上联左上角题:“先生吾兄雅命”,“先生”上被挖二字,后虽作了一补丁,但仍留有痕迹,这也是此作品唯一缺憾。下联题款:“癸酉冬日余绍宋”,左下方分别有二印“余绍宋印”“越园”。印在宣纸,剪下贴在红纸上,符合旧时用印规制。而此两方印为王福庵所刻,属越园较中意之印。

虽从落款上已不知送与谁,但综合各方面信息,可做一推断。

越园作品中,落款有某某仁兄、某某吾兄之别,若是亲戚一般会直接写上称呼关系。比较而言,“吾兄”常见于关系较密之友,而“雅命”则指尊称对方嘱咐或建议之事。

与原藏者交流时得知,此联出自金华一大家族,因后人觉得将祖宗之藏流于市场,有失体面,故将上款挖掉。仅知此人祖籍为金华人。

在越园朋友圈中,有金华蒲塘的王孚川、浦江的蒋莲僧、兰溪的诸葛源生和义乌的朱献文等,而王孚川、朱献文与越园交情较为深厚。根据下款“癸酉冬日”内容及《日记》分析,自1933年秋冬起,唯与王孚川交往甚多。“十月廿六日。七时约王孚老同访鲁主席,谈边防事甚悉,不能悉书也,衢防危机已迫,奈何奈何。出省府后同孚老赴老聚胜吃饭,到十叔处。”“十二月七日。访王孚川不值,到十叔家一谈。”“十二月八日。访王邈达已赴绍兴不遇,十叔来,詹仰尧、王孚川、陈伯衡、吴茂之、童果行、寿毅成先后来。”“十二月十一日。写字屏联等凡十件。”“十二月十二日。书联五对。”等。

王孚川何许人也?其名廷扬(1866年至1937年),清光绪二十四年(1898年)进士,历任留日学生监督、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、浙江省视学等职。宣统元年(1909年),当选浙江省咨议局议员、北京资政院议员。民国成立时,任浙江省都督府顾问,出任义乌县民政长,后当选第一届众议会议员、省议会议员。1914年起,历任江西高等审判厅书记官长、浙江省临时参议会和第二届省议会议员、临时参议院议员、自治筹备处评议员、中国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监察委员。工书法,善榜书,常赖此自给。一生不置私产,至老栖止无所。70寿诞,友好集资赠送楼屋一座,即日书契写明身后捐献聋哑学校,又立遗嘱将书籍70余箱全部捐赠蒲塘小学。著作有《湖山草堂集》《山鸟山花馆文稿》《诗选》

等。越园在留学日本及司法部任职等与孚川多有交集,可称故交。

从王孚川履历,当受得起此联。或许越园题字时,还隐有《梁书·王僧儒传》王姓之意,这也是其用笔之妙。

越园与孚川交情在《日记》也多有体现。“1937年2月27日。王孚川、孙俦仁、高鱼占、童果行、十叔诸人来。”“3月3日。宋廷华来,告孚川先生忽于今晨无疾而终,不胜感痛,念此数年来凡上江地方公事,余均与联名主张,多所裨益,今此老成忽逝,余将安所依从耶?本拟即日哭临,而因意儿须施手术,只得在家静候医师之来。”“3月8日。作联挽王孚川云:‘旷代见清才,平生委宛卷舒,即此雅怀难共喻;吾乡正多事,嗣后呼号奔走,不知马首又谁瞻。’”当然,这只是我之浅见,未必真确。如,“吾兄”当是年龄相仿的同辈,而孚川较越园长十六岁,越园一般不会用“吾兄”称之,应称孚老、孚翁。若不是孚川,那此联又送给谁呢?或是一代儒医王邈达,他与越园交往甚密,且年龄相仿,可并非金华人。

此联更在于书法之精妙。民国十七年七月,余越园自天津来到杭州,在北山街原82号赁屋而居。他发起的“东皋雅集”,聚集了杭城书画高手,一起切磋书画艺术、交流所藏珍品。在杭十年间,除了著书立说,便是写字作画。这个阶段,也是越园书法渐为成熟之时。这幅作品,本土书画家余久一有如是言:“此书甚工整敦厚,朴茂浑沦。余氏早年受晚清流风所煽,筑基北碑,浸淫日久,初具规模。及辞官南归,定居湖上,辄倾心帖学,致力于《书谱》,而对赵孟頫法书尤为用心揣摩,故此联碑帖兼融,碑底而赵面,为余氏端庄整饬书风之代表。”